

大连图书馆藏“满铁资料”中 珍稀本满语、满学图书撮要

薛 莲

大连图书馆藏古旧满文文献十分丰富,有图书、内府档案、舆图、碑刻拓片等。其中的满语、满学图书既有 1911 年前出版的线装古籍,又有 1949 年以前国内外出版的各种版式书籍。这部分藏书为“满铁资料”的一部分,是满铁大连图书馆和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旧藏,满铁的藏书印,清楚地标明每部书的入藏时间。《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①收录大连馆藏满文图书 280 余种,2520 余册;《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②收录满文图书 411 种,3179 册等。但从目前情况看,以往整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以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就不包括在内。现在经过整理,统计出满语、满学图书共 440 余种,3300 余册。其中满汉文合璧 256 种,满文 125 种,满蒙汉文合璧 35 种,满蒙文合璧 5 种,满朝文 1 种,满藏汉文 2 种,满蒙藏文 1 种,梵藏满汉文 1 种,汉满蒙日文 1 种,汉女真日文 1 种,满蒙藏汉文 4 种,满蒙藏维汉文 1 种,日汉满文 3 种,满日文 2 种,日文 5 种等。

一、珍稀本满文图书提要与考证

大连图书馆藏孤本满文图书约 120 多种,下面介绍其中几种:

1.《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二卷附补编四卷

满汉蒙藏维文合璧,三十六册,线装,民国影印本,页面高 28 厘米,宽 14.5 厘米,版框高 19 厘米,宽 10.8 厘米,白口,四周单边,半叶 4 行,小字双行,版心依次为满文书名、类目,汉文类目、页码。钤“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 民国 37 5.17”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每册末页又钤油印字“东洋文库殿寄赠”朱文方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军接管日属“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称谓,直至 1950 年 12 月由旅大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旅大图书

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②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年。

馆”。二战后期,各种原因致满铁大连图书馆大批图书包括相当数量的古籍没有分编,战后仍有个别日籍馆员被留用,整理各种图书资料。椭圆形为满铁藏书印的风格,“东洋文库殿寄赠”是满铁藏书印记,因此可以断定这部书仍为“满铁”藏书的一部分。

《御制清文鉴》始编于康熙十二年(1673),历经35年,康熙四十七年完成并刊印。后来,以此为基础增补成《御制增订清文鉴》,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定,将原有词汇译为汉文,并附有满文对音,以及满文的汉字切音。《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则是乾隆四十四年敕撰,乾隆五十七年校刊发行。《御制四体清文鉴》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纂启动时间现在尚无定论。但最晚至乾隆四十二年,“四体”与“五体”都已在编纂当中;而后者是在前者的编写过程中,奉旨增加维吾尔文及其满文注音,并在原藏文下添注两种注音而成^①。三、四、五体的增修,使《清文鉴》系列臻于完善,堪称康乾盛世之作。

《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成书时间约为乾隆五十六年,早于《御制四体清文鉴》的乾隆五十九年。现在看,它是一系列《清文鉴》中最具语言学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一部:以阿里噶里字(一种蒙文注音系统)和满文字母为藏文注音,并加维吾尔(回)文及其满文注音而成五体,特别是维吾尔文为今日少见之古字。其成书之后并无刊本大量发行,文物价值较高。从留存至今的清宫档案看,当时只有三部抄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载,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懋勤殿收存两部^②;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载,盛京(今沈阳)故宫收存一部^③。从《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看,国内现仅存有两部抄本,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另一部藏雍和宫。《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④载日本东洋文库藏一套四函三十六册,但无其他版本项著录。日本著名学者、“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的内藤湖南于1912年曾到沈阳故宫的翔凤阁,在秘密状态下以十天的时间,拍摄了整部《五体清文鉴》,共计2600页5300多张照片。内藤湖南还提及,“听说百鸟库吉博士曾经在法国巴黎见过同样的本子,如果果真与我们拍摄的这本相同的话,那么,也许是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掠得

①②江桥《御制四五体〈清文鉴〉编纂考》(《历史档案》2000年1期)云,五体成书大致在乾隆五十六年,早于四体,但未大量刊印,懋勤殿在乾隆朝仅收存2部。其依据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懋勤殿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书籍中已有五体《清文鉴》,而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书籍中才有四体《清文鉴》样本一部,可见五体早于四体成书。但翻遍乾隆朝懋勤殿收存书籍档,仅有两部在录。”

③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之“盛京内务府594”、“盛京内务府24348”、“盛京内务府19003”。

④富丽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

的”^①。但曾存于沈阳故宫的一部现不知所归。

大连馆藏的这套影印本不见各家书目著录,从印记看,来自日本东洋文库,但底本为三部抄本中的哪一种、底本来源、影印时间等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2.《清语老乞大》

满朝合璧,存一册(卷一,原书目录卡片著录“7册缺”),线装,乾隆三十年(1765)箕营(平壤)刊本。为典型的朝鲜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6行,满文单行,朝鲜文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单花纹鱼尾(四片两两相对、向中心倾斜的阴文叶状图形,有别于中国古籍中的花鱼尾),汉文书名、卷次、页码,单花纹鱼尾;开本宽大,页面高33.2厘米,宽21.9厘米,版框高25.5厘米,宽19.3厘米;纸质为高丽皮纸,纸纹清晰,色白而有韧性。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9 1 15”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一末有乙酉年(乾隆三十年,1765)洪启禧汉文《清语老乞大新释序》。

《清语老乞大》是朝鲜(高丽、朝鲜王朝)编写、刊行的满朝文双语教材,为当时朝鲜人学习满语(时称清语)口语时所用。采用朝文为满文注音,朝文意译的形式刊印,是稀见的朝语、满语合璧本古籍。韩国成百仁等认为^②，“老乞大”是“老汉儿”的意思。《老乞大》最初用汉文写成,是朝鲜培训官方译员的汉文口语教科书,出版年代不详,但推测是产生于高丽王朝。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商人往来北京和韩国王京之间的各种经历,以对话形式出现,内容十分贴近现实。后来在朝鲜被译成《蒙语老乞大》、《清语老乞大》、《倭语老乞大》(但《倭语老乞大》今已不存在)。第一个手写本的《满语老乞大》据说是一个朝鲜

①(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等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30—40页。

②(韩)成百仁、高东昊著,蒋理译、许明玉校:《韩国的满语研究概况》,《满语研究》1999年第1期。而关辛秋:《元以来一部多个语种版本的第二语言教材——三种文本〈老乞大〉教材编写特点分析》(《汉语学习》2004年3期)则认为,“汉文本《老乞大》使用了至少400年,可能是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对外汉语教材。《老乞大》最早的作者不可考,有人认为是来到中国辽东的朝鲜人,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无疑。在其成书年代问题上存在着是元末还是明初的分歧,多数人主张编纂于元末”,“蒙文本《老乞大》存在了至少374年,蒙文本《老乞大》使用的上限不易确定,一般认为《老乞大》最早的版本是蒙语本,不是汉语本,即蒙语本出现的年代早于汉语本,在元末之前。但由于多年来没有人见过蒙语本,蒙文本的说法还是个推测”。关辛秋文中又引用胡明扬先生的观点,“《老乞大》一书国内学者据书名推测最初当为元代蒙古人为蒙古子弟所编汉语读本之名,因其他各族从无称汉人为‘乞大’者。‘乞大’疑即‘契丹’之音转,如俄语亦称中国为КИТАЙ。因此,原本当为蒙文本,惜至今未见蒙文本,其他各民族版本似当为蒙文本翻版。但此种猜测始终未获确证。”

人翻译的,他在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之役后返回朝鲜。1684年被汇编成《新翻老乞大八卷》,1703年木版刊刻出版。但这两个本子久已失传。目前流传的1765年的本子《新译清语老乞大》八卷是在1703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目前此书仅存英国大英图书馆、巴黎的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日本的驹泽大学(Komazawa)图书馆,而巴黎的一套为影印本。直到现在《清语老乞大》对满语研究及满语对话教学仍十分重要,因为1684年的新版《新翻老乞大》和1703年现已不存在的木版是现知的最早的满语对话教科书。台湾庄吉发于1976年曾将其译成汉语,日本津曲敏郎则于1977、1978年将其译成日语。

大连图书馆藏虽为残卷,但仍有版本和史料价值。

3. 《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不分卷

满汉合璧,二十册,内府朱格精抄本。页面高30厘米,宽26厘米,版框高22.5厘米,宽17.8厘米;半叶10行,汉文行21字,小字双行,满文行字不等;版心有单红鱼尾;有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书签为黄绫墨笔题“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包括堂谕一册,汉文;上传三册,其中满文一册,汉文二册;来文七册,其中汉文六册,满文一册;仪注二册,满汉合璧;奏销四册,其中满汉合璧二册,汉文二册;尊封事宜二册,满汉合璧;杂项一册,满汉合璧。

记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六日,止于道光元年(1821)七月十一日。这期间正是嘉庆帝七月二十五日驾崩,宫廷内外举办丧事、道光帝继位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期,如仪注二册,记载有“礼部奏为大行皇帝大事治丧成服仪注事”、“礼部奏为大行皇帝遗诏到京王大臣等在午门听宣仪注事”、“内府等衙门奏为大行皇帝梓宫由热河奉移一切仪注事”、“礼部为奉移大行皇帝梓宫回京仪注事”、“本府奏为八月二十七日皇上登极是日在皇太后前行礼仪注事”、“礼部具奏大行皇帝尊谥颁发诏书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上行礼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太后行礼仪注事”等,对清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不见其他书目收录。

4. 《新约全书》二部

满文,一册,精装,铅印本,版式为“中西合璧”。页面高23.2厘米,宽15.3厘米,厚度为4.1厘米;版框高16.9厘米,宽13.9厘米;四周双边,半叶13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满文“enduringge ewangelium”(拉丁字转写,下同)和汉文页码;虽非筒子叶,但按筒子叶计页数(即两面为一页);全书共分八章节,各章页数分别是63、39、68、53、69、86、72和66页;无版权页。书名页印满文“ice hese”;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11.12.11”、“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 17.2.18”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从钤印看,其入藏时间是1936年和1942年。

满文《新约全书》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文图书,传世稀少,大连馆藏不见各种满文书目收录。

日人渡部薫太郎 1932 年曾对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满洲语新约全书》做了提要:1822 年,俄国人ステファン・リポウゾフ(即 Stepan Lipovtsov——作者注)译完“马太传”的最初七章。1823 年,“马太传”印刷 550 部。1825 年《新约》全部译完,俄国没有出版。1833 年,ノールウイチイ的ポウロウ(即 George Borrow——作者注)为印刷此《新约》,被聘到俄首都圣彼得堡。1835 年(一说 1836 年)印刷 1000 部满文《新约全书》……1855 年,此满译本《新约全书》的 200 部航运上海,途径爪哇,发生海难,200 部《新约全书》一卷未留,全部丢失……该书内容如下,现今印刷的任何一种文字《圣经》,都是章节分列,而满译《新约全书》却有章无节,只分二十七卷为八部,每一部分页数大致相同,推想可能是为印刷便利……^①。

而据韩国金东昭考证,铅印本满文《新约全书》只有一个版本,即上文已经提到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满洲语新约全书》,由 S. V. Lipovtsov 于 1825 年翻译成满文,1835 年在 St.Petersburg 出版。目前此书在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5 部,“大英圣书公会”藏 3 部,伦敦的“印度图书档案局”藏 1 部。苏联(原文如此——作者注)科学院亚细亚民族研究所收藏 1 部(1864 年被收集),著录为 8 卷,每卷的页数分别为 61、37、57、40、52、60、130 和 50,每页记有 12 行满文^②。

中国学者肖玉秋指出,“最早将东正教书籍译成中华语言的是第 8 届传教士团学生利波夫措夫,他在 1794 年至 1808 年间就完成了《新约》的满文翻译”,“利波夫措夫的满文译本没有得到俄国圣务院的批准,被英国圣经公会拿去出版。天主教传教士在其东北的教会学校中使用利波夫措夫的译本做神学教材,并用它来在满人中传教布道”,其翻译满文《新约》目的是“维持雅克萨战俘及后代的东正教信仰”^③。

5.《新刻清书全集》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听松楼刻本。白口,四周双边,书名页镌满汉文“新刻清书全集”,“听松楼藏本”,钤“听松楼”朱文方印和饰以花草图案的朱文圆印。其特殊处在于第二、三、四、五册为两节版,中间以三条细栏线隔开。一部书有两种版式,两节版的三条细栏线设计都比较独特,为中文古籍中所不多见。

6.《四书集注》十九卷

满汉合璧,十四册,道光十八年(1838)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刻本。白

①(日)渡部薫太郎编著:《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昭和七年(1932),第 43-44 页。

②(韩)金东昭著,金贞爱译:《东洋文库藏现存满文圣经稿本介绍》,《满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92-96 页。

③肖玉秋:《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93-103 页。

口,四周双边,半叶十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书名,单黑鱼尾,汉文页码。书名页镌“四书集注”、“满汉字合璧”、“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藏板 道光戊戌秋月重刊校对无讹”、“每部纹银肆两整”。牌记中直接标明书价的满文古籍图书比较罕见。

7.《满洲姓氏世居谱》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抄本。各册首页钤“纳哈塔氏”朱文椭圆印、“孤鸿和尚”朱文方印,《高丽姓氏》册封皮钤“吟秋山馆”朱文长方印,函套内侧有“银壹两”印记。此部书为抄本,“银壹两”盖是函套价格。

二、日文满语、满学图书提要

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大连馆藏数量虽然不多,只有12种,21册,但特点鲜明。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拥有一批老一辈的满学满语研究者,其中的羽田亨和渡部薰太郎的著作,大连馆就有收藏,仅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的论著就有6种10册,几乎涵盖了其一生的关于满语、满学的重要著述^①。这部分图书的装帧形式可谓“中西结合”,一般是油印或铅印本,有筒子叶,有线装,也有洋装、精装:

1.《满语文典》

(日)渡部薰太郎编著,满日合璧,一册,线装,大正七年(1918)间岛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行、字不等,版心有汉文页码。封面墨笔题“满语学丛书第一辑 满语文典 完”,书名页印满文书名“manjurame kooli”,“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朱笔题“著者谨呈”。钤“S.M.R.·LIBRARY·S.M.R. 9.4.2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大正七年《满语学丛书发刊之辞》,同年薰风《绪言》。卷末版权页印“大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行”、“编辑兼发行者 支那间岛龙井村 渡部薰太郎”。

渡部薰太郎(1861-1936),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的满语满学研究者。早年学习英语,后来沉湎于满语、女真语的研究,并致力于整理编纂出版这方面的图书资料。这部书是他亲笔题名赠送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也是其一生中出版的第一部论著。《绪言》中言及“从编辑、印刷到装订过程,乃自己完成”、“以誊写版印刷本书,作为满语课本之第一卷”。

2.《满洲语图书目录》两部

(日)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大正十四年(1925)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钤“S.M.R.·LIBRARY·S.M.R. 2.10.11”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

^①(日)石滨纯太郎著:《故渡部薰太郎先生》,《东洋研究史》第二卷第一号,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文后附有“渡部先生论著目录”,按时间顺序详细列出十五种,其中关于满语、满学的有十四种,另外的《女真馆来文通解》(昭和八年大阪刊)大连馆也有藏。

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题“大正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题“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前有《清汉元音字典》和《御制性理精义序文》两部书的书影，大正十四年（1925）二月编者绪言。“目录目次”将所收满文书分为“言语部（27种）”、“政治部（6种）”、“道德部（20种）”、“宗教部（4种）”、“哲学部（3种）”、“历史部（3种）”、“文集部（3种）”、“稗史小说部（6种）”、“兵法部（1种）”、“天文部（1种）”等10类。正文以汉文（少数以日文）列书名，以日文做提要，满文书目以日文标注读音，而不写满文。

3.《（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两部

（日）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昭和七年（1932）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钤“大连图书馆 7.10.19”蓝文椭圆印，钢笔书写“大阪东洋学会寄赠”。封面题“昭和七年十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题“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卷前有《御制四体清文鉴》卷十三“人部四”和《西游记》第十四回“六贼无从心猿归正”的书影，汉文“奉呈文”及编者昭和七年九月“满洲国承认の日”的序。

渡部薰太郎序中称，此目录包含大阪外国语学校的满文图书128种，满铁奉天医科大学预科教授ダブルユー・フックス氏1931年的满文书目36种，ヒ・ヅ・フラン・メーレンドルフ氏1890年的满文书目249种，アレサンダ・ワイリ氏1855年的满文书目59种，合计472种，除去重复有370种。正文编排体例同上。

需要注意的是卷首的“奉呈文”。该文是1932年大阪东洋学会拜谒“满洲国执政溥仪大人阁下”奉呈的，读其文，则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溥仪伪满政权、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其竭力搜集、刊行满文文献的目的，亦溢于言表。

4.《满洲语缀字全书》

（日）渡部薰太郎编，汉日满合璧，一册，精装，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汉文页码。钤“S.M.R.·LIBRARY·S.M.R. 5.6.23”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钤“大阪东洋学会（钢笔书写——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卷前有女真人和契丹人画像各一张。卷末印“昭和五年三月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九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辑”、“满洲语缀字全书”、“大阪东洋学会”。

5.《新编金史名辞解》两部

（日）渡部薰太郎编，汉满蒙日合璧，一册，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半叶十三行，行字不等。钤“S.M.R.LIBRARY S.M.R 昭. 7.3.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渡部薰太郎

(钢笔题——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题“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著”、“新编金史名词解”、“大阪东洋学会发行”。卷前有女真人画像一张,题字为女真文,背面是日文的女真文字说明,昭和五年大阪东洋学会会长中目觉序和著者识。正文先列出《金史》中的汉文词汇、其在原书(《金史》)中的卷次和页码,然后注明其所属类别如“人”、“地”、“姓”等,再说明其来源(蒙古语或满语),译出其对应的汉语,以拉丁文标注读音,最后以日文做解释。

6.《女真语ノ新研究》二部

(日)渡部薰太郎编,汉女真日文合璧,一册,昭和十年(1935)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昭.11.3.18”朱文椭圆印(另一册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昭.10.4.1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书名页题“昭和十年一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著”、“女真语ノ新研究”、“大阪东洋学会”。卷前有昭和十年著者序文,“目次”则列出全书的三个部分:“类集女真译语”、“(语头画引)女真语汇”和“译语丛谈”。

“类集女真译语”将所列词汇按“天文部”、“地理部”、“时令部”、“花木部”等17个部分分类,正文先是汉文词汇,女真语的汉文读音,女真语的拉丁字读音,最后以日文解释其意义。在解释中将部分女真语与满语和汉语做比较说明。“女真语汇”部分的女真语词汇是以汉文标注其读音,然后是对应的汉语词汇。“译语丛谈”阐述了女真族、女真人和女真语的历史,将新旧女真语进行详细比较,又与满语、汉语进行了比较。

7.《(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

(日)小山爱司编著,日汉满合璧,二册,线装,昭和九年(1934)东京中央学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九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中国朝代名(从三皇、五帝至清代)、汉文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10.7.26”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名页题日汉满文“小山爱司编著”、“上卷 人名之部”、“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东京”、“中央学会版藏有”。卷前有昭和七年“官房总务课长、书记官”横沟光晖序、昭和九年“内阁官房记录课长、内阁书记官”川岛孝彦序,昭和九年著者序文。卷末版权页印“昭和九年七月一日发行”,钤“中央学会”朱文方印;下卷为“地名之部”。正文每行以日、汉、满的顺序行文,按中国朝代顺序编写,正文后是附录和字表。

8.《满和辞典》

(日)羽田亨编,满日合璧,一册,精装,昭和十二年(1937)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铅印本。封面印满文书名《满和辞典》、“文学博士”、“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刊”,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

馆 昭.13.2.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羽田亨”的序。

羽田亨(1882-1955),日本历史学家。曾从事调查研究敦煌文献,被称为日本研究西域文化史“权威”。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①。

9.《满蒙言语の系统》

(日)石滨纯太郎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九年(1934)岩波书店铅印本。封面印“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东洋言语の系统)”、“满蒙言语の系统”、“石滨纯太郎”、“岩波书店”,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9.11.2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底版权页印“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 第五回本”、“发行所(东京)岩波书店”。全书分四个部分:“满蒙言语”、“アルタイ语”、“蒙古语”、“满洲语”。

石滨纯太郎(1888-1968),日本东方学会会员,中国古代史、西域史和中国少数民族语学研究家。曾随内藤湖南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及东方学研究状况,后主要从事回鹘、西夏等民族语言佛典的研究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组织西域文化研究会,整理大谷文书为中心的敦煌吐鲁番资料,完成《西域文化研究》全六册的编辑和部分撰稿工作,著有《东洋学之话》、《支那学论考》等^②。近年来,我国又有学者提出“敦煌学”一词首先由石滨纯太郎创用^③。

10.《满洲语のはなし》(《满洲语之话》)两部

(日)今西龙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六年(1931)双色打印本。卷端题“青邱说丛卷二 昭和六年一月”、“满洲语のはなし”、“今西龙”,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12 2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中论述了满语的发展历史。

11.《满洲语史》四部

(俄)イ・ザハノロフ(伊·扎哈诺罗夫——音译,作者注)著,(日)布村一夫译,日文,一册,昭和十八年(1943)满铁调查部铅印本。封面印“满铁调查月报别刷第八十三号”、“昭和十八年二月号(第二十三卷第二号) 拔刷”、“满洲语史”、“满铁调查部”,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5.1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编纂殿寄赠”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题“イ・ザハノロフ”、“布村一夫

①日本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日本人物辞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②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③方广钊:《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敦煌学辑刊》2001年2期,肯定了王冀青提出的“敦煌学”一词首先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创用。

译”。

12.《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满洲语与汉语混用的歌本吃螃蟹》)两部

(朝鲜)金九经编著,汉满日合璧,一册,满铁奉天图书馆铅印本。封面题“奉天图书馆丛刊第二十一册”、“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金九经”;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0.11.12”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此文曾在《满蒙》第十六卷第九号(大连,1935年)第222-242页上发表(大连馆有藏),单行本则较为少见。

金九经,字明常,朝鲜鸡林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在初创的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民国十九年、二十年曾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课。与鲁迅、胡适等中国学者、文人有交往,与魏建功相交善。后客居沈阳,刊印古籍史料。

关于“歌本吃螃蟹”,郑振铎先生曾以“二酉”署名,在1947年9月26日《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发表《“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跋》一文,对此进行了考证和研究^①。

“满汉歌本吃螃蟹”的研究,至今对中国俗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满族文学和满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研究员和大连图书馆王小川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谨致谢忱。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图书馆古籍部

^①关家铮:《郑振铎书跋二则》,《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年1期。